

杨曾文 主编

日本近现代
佛教史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13 949.313

Y337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

杨曾文 主编
杨曾文 张大栢 高洪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淑英

封面设计：王义钢

责任校对：韦 伟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

杨曾文 主编

杨曾文 张大柘 高洪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6 字数 36.6 万 印数 1-6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246-0/K · 337 定价：30.00 元

前 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连接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沟通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

佛教是怎样传入日本的？中日佛教存在着怎样的血缘关系？佛教是如何与日本传统文化习俗相结合而演变为日本佛教的？日本佛教有哪些宗派？佛教在日本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日本近现代的佛教发生过什么变革，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起过怎样的作用？日本的佛教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对此，人们是抱有深切的关心的，并且也是饶有兴趣的。中国学术界虽然专门从事日本佛教研究的人较少，但是毕竟有更多的人在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论文、专著和译著问世。对于日本佛教研究的成绩，今后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我在1964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当时研究所刚刚建立，为全面了解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全所把调查研究各国宗教现状作为主要任务。我一边学习佛教基本知识，一边通过日本书籍、报刊考察日本佛教现状。这一工作后来因十年动乱而中断。1979年以后，我投入由任继愈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的编写工作，然而每年我仍断断续续抽时间对日本佛教的历史和现状的某些专题进行研究。从1990年至1993年我集中主要时间撰写《日本佛教史》。此书以论述佛教在日本的初传、发展以及日本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的形成为重点。此后，我与张大柘、高洪两位同志合作编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现在总算把它完成并奉献给各位读者。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八个部分：一、为便于读者对日本近现代传统佛教宗派以及佛教制度变革的理解，特设“绪论”概要介绍日本民族佛教的发展历程，影响到近代以后的重要制度，日本佛教在近现代面临的重大课题等；二、明治维新过程中发生“废佛毁释”的排佛风潮，佛教原有的准国教地位的丧失以及它为适应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所进行的变革，佛教界的文化思想动向；三、二战前日本在国内外推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势，佛教概况及其思想动向，战时佛教在统制体制下的被扭曲和被利用等；四、二战后社会制度和宗教法制的巨大变化，佛教教团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重建；五、新兴宗教的崛起和传播，佛教系新兴宗派的特点，主要的新兴教派；六、佛教界参与的和平民主运动，佛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七、在世界人文科学界享有盛誉的日本佛教研究的概况；八、日本佛教各派从战前以来在亚洲和南北美洲传教的情况。

1989年春，我们以“日本的佛教和佛教研究”的课题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准备写《日本佛教史》和《日本的近现代佛教和佛教研究》两部书，原计划在1992年底全部完成。然而由于当初估计不足，再加上中间掺杂有其他事情和编写组成员的变动，1993年我才完成《日本佛教史》的写作，而第二部书拖到今年才最后完成，并把它名称改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虽参考了很多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和报刊资料，但限于条件仍有不少图书资料没能掌握利用。日本近年出版的由圭室谛成监修的《日本佛教史Ⅲ·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出版），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监修的《亚洲佛教史·日本编Ⅷ·近代佛教》（佼成出版社1972年出版），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吉川弘文馆1990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并且比较客观介绍日本近现代佛教的著作，我们经常参考和

利用。在此我们向它们的作者表示敬意。我们经常利用的日本报纸有《中外日报》、《佛教时报》等。

然而，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所掌握的资料，在书中对有些方面的问题难于作细密的考察，对有的问题仅仅作了简单的粗线条的介绍，对此敬请读者鉴谅；另外，对有些本应介绍的重要问题也许有所遗漏，在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中很可能存在欠当或错误之处，也谨望读者发现后予以批评指正。

在即将向出版社交稿之际，谨向在我们写书过程中曾予以各种帮助、支持和热情鼓励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历届领导、同事，向所科研处、办公室和图书馆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1—1992年，笔者曾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组织的邀请并承蒙京都大学竺砂雅章教授的接待，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一年，于写作《日本佛教史》之余为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搜集了不少资料。在本书编写的最后阶段，日本《中外日报》社的本间昭之助社长、东京大学镰田茂雄名誉教授、创价学会的三津木俊幸副会长、灵友会的久保继成会长和心灵之旅综合研究所的今井稔所长、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教授、华顶短期大学的落合俊典教授、加藤荣司先生等，都曾为我们提供过热情的帮助或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

在人文科学图书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承蒙浙江人民出版社应允接受出版此书。我们向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向负责编辑此书的杨淑英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谨表谢意。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杨曾文

1994年8月4日于北京南方庄公寓

目 录

前言	1
一、绪论	1
(一) 日本佛教的民族化历程	2
(二) 日本的主要佛教宗派	9
1. 奈良系佛教	9
2. 平安系佛教	12
3. 镰仓系佛教	15
(三) “准国教”地位的确立和影响深远的佛教制度与风尚	25
(四) 日本佛教的民族特色	31
(五) 佛教在近现代面临的问题及其抉择	33
二、明治维新与佛教	37
(一) “神佛分离”与“废佛毁释”	37
1. 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	37
2. 政府的“神佛分离”政策及其影响	40
3. “废佛毁释”运动始末	45
4. 民众“一揆”与排佛风潮的平息	50
(二) 佛教地位的确立和政府的佛教政策	54
1. 明治初期政府的宗教政策与佛教的地位	55
2. 政府改弦更张, 佛教渐趋恢复	58
3. 自由民主思潮与颁布《帝国宪法》对佛教的影响	63
4. 日本迈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佛教走向	69

(三) 佛教适应近代社会的改革	75
1. 政府的土地政策削弱了佛教教团的经济基础	75
2. 佛教教团组织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	78
3. 废除寺请制度与残存的寺檀关系	83
4. 居士佛教运动兴起	84
(四) 佛教界的思想文化动向	85
1. 海外留学、创办学校和佛教报刊的热潮	86
2. 经纬会与新佛教徒同志会的活动	91
3. 清泽满之的“精神主义运动”	97
4. 伊藤证信和无我爱运动	101
5. 日莲主义和国粹主义、国家主义	103
6. 无政府主义和佛教	105
三、大正、昭和前期的佛教	108
(一) 大正、昭和前期的社会与佛教概况	108
1. 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	108
2. 大正时期的佛教概况	117
3. 昭和初期的日本社会与佛教	128
4. 新兴宗教的育成与发展	140
(二) 佛教的政治和文化动向	152
1. 部落解放和国柱会	152
2. 佛教的文化活动	159
(三) 战时统制与佛教	162
1. 战时的法西斯专制政治体制	162
2. 战时统制体制对宗教的扭曲和利用	164
四、战后佛教的重建和发展	177
(一) 战后的日本社会和宗教概况	177
1. 战后宗教的时代背景	177

2. 战后宗教概况	185
(二) 佛教教团的重建和各宗派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教活动	196
1. 重建佛教教团的尝试	196
2. 传统佛教界的统一与联合	213
3. 传教新方式的导入	220
4. 佛教各宗态势大观	226
五、新兴佛教宗派的兴起	241
(一) 战后新兴宗教的迅速崛起和传播	241
1. 强有力的组织传教活动	244
2. 现代化大众媒体的传播	247
(二) 新兴宗教的教义及活动特色	249
1. 教义特点	249
2. 组织活动的特点	253
(三) 佛教系主要新兴宗派	255
1. 创价学会	255
2. 立正佼成会	268
3. 灵友会	274
4. 佛所护念会	280
5. 真如苑	282
6. 念法真教	285
7. 妙智会	287
8. 解脱会	289
9. 孝道教团	293
10. 阿含宗	295
11. 其他教团	298
六、当代佛教与政治、文化	304
(一) 佛教与政治	304

1. “靖国神社”问题	304
2. 为和平而战的日本佛教徒	309
3. 佛教对政治的直接参与	321
4. 日本佛教界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作用	328
(二) 中日佛教交流的新篇章	330
1. 当代的中日佛教交往	330
2. 中国佛教名山古寺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活动	340
3. 日本佛教界对华友好组织	344
(三) 佛教和文化、教育	348
1. 佛教的文化艺术活动	348
2. 日本的佛教教育	350
七、日本的佛教研究	362
(一) 海外留学和近代佛学的兴起	363
(二) 日本近现代佛学和佛教研究的奠基者	367
(三) 印度佛教和南传佛教的研究	375
(四) 中国佛教的研究	380
1. 研究中国佛教的著名学者	380
2. 佛教通史和断代史等方面的著作	387
3. 佛教宗派研究	393
4. 藏传佛教研究	401
5. 古西域和敦煌佛典的研究	402
(五) 日本佛教的研究	405
(六) 朝鲜佛教的研究	412
(七) 佛教丛书、辞书和其他工具书的编纂	413
1. 佛教丛书	413
2. 佛教辞书、工具书	417
(八) 佛教研究机构、学会和刊物	423

八、日本佛教在国外	430
(一) 二战结束前日本佛教各宗的海外传教活动	431
1. 在朝鲜的传教	431
2. 在中国的传教	433
3. 在南北美洲的传教	440
(二) 战后日本佛教在美洲的传教概况	446
1. 在美国的日本佛教	446
2. 在加拿大的日本佛教	451
3. 日本佛教在巴西	452
附录	
一、日本宗教团体、传教人员、信徒统计表	456
二、佛教系统的寺院、传教人员、信徒统计表	457
三、日本有代表性的新宗教派别发展趋势表	458
四、日本佛教宗派一览表	459
五、日本近现代佛教大事年表	471
六、主要参考书目	478

一、绪 论

按照日本的历史分期，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从佛教传入日本，中经奈良时期，到平安时期结束，是古代佛教（6世纪—1192年）；从镰仓时期到室町时期，其中包括战国时期，是中世佛教（1192—1568年）；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到江户时期结束，是近世佛教（1568—1868年）；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现在，为近代佛教。

“近代”这个概念在日本既包括“近代”，又包括中国史学界所说的“现代”在内。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一般看法，从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世界进入现代时期，在日本大体相当于大正前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之时。然而日本也有“现代”的分期，不过那是特指二战之后的时期，像中国一般所说的“当代”。因此，日本的佛教史书上所说的“近代佛教”实际是包括日本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佛教在内的。

本书所论述的是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为止的日本佛教的历史，其中经历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昭和（1926—1988年）三个时期，并涉及刚开始不久的平成（始于1989年）时期。因为日本近现代的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编写中把佛教置于各个历史时期之中，并密切结合社会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历史变革来加以考察论述。

日本近现代佛教是日本古代佛教的延伸和发展,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传统佛教,日本称之为“既成佛教”,即从佛教传入到镰仓时期形成的日本民族佛教主要宗派,按照它们成立或兴起的时期来分,包括奈良系佛教、平安系佛教和镰仓系佛教的各个宗派;二是佛教系的新兴宗教(或称新宗教),它们或创立于战前,或创立于战后,但都在战后迅速崛起,或多或少地仍尊奉传统佛教宗派的教祖和教义,同时又吸收神道、基督教等的教义思想,运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和传教方法。

因此,如果对日本古代民族佛教的历史不了解,对日本近现代的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它们的基本教义理论、所发生的演变及其社会作用就难以深入理解。本书为了论述的需要,并为读者提供方便,在此首先对日本古代佛教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宗派、重要制度作概要介绍。

(一) 日本佛教的民族化历程

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初传、普及,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会通、结合的过程,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的宗教之一。同样,佛教开始从朝鲜半岛、后从中国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之后,也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的过程,才发展为日本民族的佛教。

日本自古就与中国有密切交往。中国佛教在4世纪传入朝鲜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中百济的佛教受中国南朝佛教的影响较大。6世纪时,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献金铜佛像等,自此佛教正式传入日本。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有所谓“公传”和“私传”的说法。公传是指通过朝廷传入佛教。对传入佛教的时间有两种最有影响的

说法：一、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进献金铜佛像一躯及幡盖、经纶等，从此佛教在日本开始流行；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书记载，百济王派使者献佛像的时间是钦明天皇七年戊午（538年）。日本学术界近年多采用后一种说法。

佛教私传是指通过民间的传入。根据皇圆《扶桑略记》卷三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有的书作“司马达等”）到达大和，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为日本民间奉佛之始。

佛教传入前后，日本还处于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奴隶制社会，土地由大王和臣服于他的各个氏族首领（豪族）占有，被作为“部民”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和为数不多的奴隶从事各种农业与手工业劳动。在文化上，日本虽已从大陆输入汉字和儒家经书，但流行范围还很小。在宗教上，普遍相信万物有灵，崇拜祖先亡灵，盛行巫术。这种原始信仰，即是所谓原始神道。大王不仅是全国最高的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的祭司，如主持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农耕仪礼的春秋大祭（祈年祭、新尝祭）等。在佛教刚刚传入的时候，朝廷内部围绕是否信奉佛教的问题曾发生斗争。以主管军事、刑狱的大连物部氏和主管祭祀的中臣氏为首的豪族反对奉佛，称佛为“蕃神”，说如果奉佛将招致“国神之怒”。所谓国神，是指日本固有的氏族神、部落神及自然精灵。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苏我氏由于长期接触大陆文化，因而主张积极从大陆引进先进文化，主张奉佛。争论的结果是以苏我氏兴佛派的胜利而告终。

日本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它的统一指导下迅速引进大陆先进文化，推进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日本原有的朴素的文化和宗教形态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当政者积极沟通

与大陆的邦交，引进大陆文化，加强利用儒家伦理学说，并把佛教作为大陆文化的复合体和代表，积极加以扶持和利用。圣德太子和推进“大化革新”的领导人中大兄皇子就是这样做的。

圣德太子（574—622年）是用明天皇之子，名厩户。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被立为皇太子，摄政。他自幼儒、佛兼学，有很高的汉学修养。在政治上，他制定“冠位十二阶”，根据朝臣的才能和功绩，由天皇授予不同等级的冠位，借以削弱门阀世袭制度，加强中央权威。又制定《十七条宪法》，广引中国经史，糅合儒佛思想，提倡“承诏必谨”、“君言臣承，上行下靡”的忠君思想；强调朝野上下“以和为贵”；提倡“笃敬三宝”，说：“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按：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泛指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实际把佛教看作是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要朝野臣民都信奉佛教。此后佛教传播迅速。圣德太子曾师事来日的高丽僧慧慈、慧聪等，委任他们兴隆佛法。著有《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提倡大乘佛教人人可以成佛的思想和以“慈悲为本”的菩萨济世精神。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沟通日中邦交关系。日本推古朝前后五次向隋朝派遣使者，第三次还派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长期学习文化典籍和政治制度，他们中的高向玄理、僧旻等人回国后在“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45年），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发动政变，杀死垄断朝政的苏我入鹿，后即位为孝德天皇，初设年号，称“大化”，任命中臣镰足（后改称“藤原镰足”）、阿倍内麻吕、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为左、右大臣，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推行革新。当年下诏兴隆佛法，任命僧旻、慧云等十僧“教导众僧”，主持兴隆佛教。第二年发布革新诏令，实行土地国

有和班田收授法，仿照隋唐制度确立行政机构，制定各种法律等，逐渐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封建的社会制度。

在大化革新过程中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一系列律令。为了把全国僧尼及其活动纳入以天皇为首的律令制的国家体制之内，参照唐初的《道僧格》制定了《僧尼令》，收在《大宝令》之中。此令现已不存，现存者为《养老令》中编在《神祇令》之后的《僧尼令》。为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在中央设置最高僧官机构，称僧纲，有僧正、僧都、律师，掌管全国僧尼名籍和佛教事务，上属八省之一的治部省的玄蕃寮；在地方上，各国设有国师；各寺置上座、寺主、都维那“三纲”。

日本在奈良时代（710—784年）由国家兴办的最著名的佛教事业是兴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东大寺是由圣武天皇发愿兴建的，称“总国分寺”，内奉卢舍那金铜佛像。各国（一般比今县略小）在国都建国分寺（国分僧寺和国分尼寺），分别设置僧尼，规定按期诵《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护国经典”。它们是按照《华严经》、《梵网经》所说报身佛卢舍那与无数化身释迦佛的关系而建造的，即以奈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为中心，以分散于各地的国分寺供养的众多释迦佛为佛的化身。天皇想借此提高中央朝廷的神威，以加强中央集权，还想通过东大寺和国分寺僧尼的诵经祈祷活动，保佑国家平安，五谷丰登。

随着中日佛教往来的频繁，中国的佛教宗派陆续传入日本。在开始的时候，日本僧俗信徒只是着重抄写佛典和中国人的佛教著述，研讨各宗的教义，而没有形成各派的组织。尽管各个学僧所侧重研习的宗派不同，但当时所谓的宗派只能称之为学派。9世纪以前，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佛教教学派成实宗、俱舍宗，相继传入日本，以国都奈良为传播中心，

史称“奈良六宗”。六宗是以后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其中法相、三论、华严三宗继续发展。

奈良时期由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僧人受到优厚待遇，佛教界逐渐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僧人玄昉、道镜等人的干政，激化了朝中已有的矛盾。在奈良、平安（794—1192年）交替之际，前有光仁天皇，后有桓武天皇，都对朝政和佛教进行整顿，取得一些成效。他们限制僧尼增加，禁止寺院兼并土地，要僧人严格持戒，并奖励佛学研究。为摆脱旧佛教势力对朝廷的直接影响，迁都之际不许在奈良的寺院迁入平安。并且积极支持最澄（767—822年）、空海（774—835年）入唐求法和回国传播天台宗和真言宗，以对抗南都奈良的旧佛教势力。天台、真言二宗因此发展极为迅速。

天台宗是日本古代最强大的佛教宗派。良源（912—985年）任座主时，比睿山的僧人常达3000多人，而且拥有武装僧兵。此后，圆仁的法系（在比睿山上，称山门）与圆珍的法系（后被迫迁移到三井园城寺，称寺门）的矛盾不断激化，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平安时期土地兼并愈益严重，以外戚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在各地拥有大量庄园，中央集权更加削弱，到9世纪以后天皇实际上仅拥有虚位，实权被藤原氏掌握，形成所谓“摄关”政治。日本在佛教兴盛后有不少天皇出家，称“法皇”。在藤原氏垄断朝政后，几乎每代天皇在最后都让位出家。其中有的天皇不甘心充当摄关政治的装饰品，退位后以“上皇”或“法皇”的名义设“院厅”掌政，借助中小贵族和地方武士的力量与藤原氏对抗，著名的有白河、鸟羽、后白河、后鸟羽等天皇。史称“院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扩大了佛教对上层社会的影响。

平安后期，随着地方上直接控制土地和农民的中上层武士势力的迅速崛起，古天皇制和由藤原氏垄断朝政的体制日趋瓦解，社